

● 管继平

■ 文人尺牍(三十二)

十年教海沐东风

——梁思成致舒新城

一九二三年五月七日的中午，北京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大批学生正举行着国耻日的游行纪念活动。二十二岁的梁思成，骑上大姐梁思刚刚送他的一辆摩托车，后座带着弟弟梁思永，兴奋地追赶着游行队伍……不料，刚出南长街，被横闯红灯而来的汽车撞上，后座的思永摔出好几米远，思成则血流满面，被侧翻的摩托车重重地压在地上不省人事……还好家人赶来及时，家仆背着思成送往了医院，所幸思永无大碍，只是受了一些皮肉伤；而思成经诊断，则“腰部以上没有什么毛病，但左腿断了！”当时父亲梁启超在日记中写道：只要能活下来，就是残废我也很满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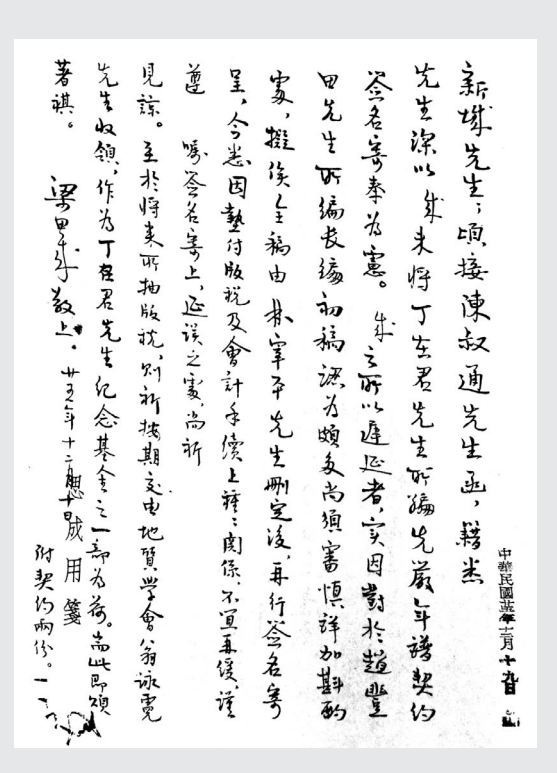
这一对兄弟其实都具有旷世之才，幸好大难未死。二十多年后，也就是中央研究院评出我国第一批院士的名单中，梁思成、梁思永，作为中国建筑学家和考古学家，均赫然在列。首批院士仅八十一人，分“数理”“生物”和“人文”三个组别，遴选评议时，都是再三权衡、几经斟酌，唯国内顶尖一流的学者可当也。像人文组的胡适、傅斯年、张元济、陈垣、陈寅恪、赵元任、顾颉刚等，个个皆名震寰宇，而梁思成、梁思永昆仲，却占据了人文组极其宝贵的二十八名席位中的两席，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了。

所有的院士中，梁思成是唯一一位建筑学家。那年他摔断腿后，推迟了留学计划，在家休养了一年，再借林徽因一同赴美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本来他俩是一同投考建筑系的，没想到宾大的建筑系不收女生，所以林徽因只得改读美术学院，还选修了建筑课程。梁思成在宾大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去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一九二八年三月，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父亲梁启超还专门写信关照思成：“你的腿能够跪拜否？若能，则结婚后第二天新夫妇同到领事馆向两家祖宗及父母双双通拜，如不能屈膝则双双鞠躬亦得，总之，行最恭敬礼便是了。”

这几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既讲规矩也懂变通。难怪梁启超可谓天下最成功的“家教专家”，他的九个子女，个个都培养成了名家，其中还出了三名院士。我想，上好的基因当然是一个因素，其次，梁启超日常有意识的循循善诱以及言传身教，自然也有相当的道理。

梁思成夫妇婚后赴欧洲实地考察古建筑，半年后回国，在沈阳东北大学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九一八”事变，他们回到了北京，梁思成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兼任北大和清华的教授，专讲中国建筑史和建筑学。梁思成是中国古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上一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虽然国家正饱受战乱之苦，但他和林徽因等人则不畏艰险，实地考察了全国二百多个县，测绘和拍摄二千件唐宋以来留下的古建筑遗物，像著名的山西辽代应县木塔、五台山的唐代佛光寺等，都是梁思成当年的重大考察成果。在梁思成之前，中国对建筑上的文物并无太大的重视，所以梁思成所做的是前人还没有想到的事，直到梁思成研究后写成论文发表，才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对这些文物的重视。据那时随梁先生一同考察的年轻学者莫宗江回忆，他们爬到应县木塔塔顶后，风格外的大，好像他们随时有被风吹走的感觉。然而塔顶上的塔刹还有十多米高，仅靠八根铁链拴着，别无其他可攀援的地方。可是他们必须爬上去，才能完成整个木塔的测绘数据。此时只见梁先生不顾腿疾，在毫无安全防护的环境下，徒手抓着铁链，攀上了塔刹刹尖……要知道这可是一座千年古刹啊！历经九百多年的风雨侵蚀，铁链上锈迹斑斑，几乎随时都可能断裂之危。还好有惊无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也可见出古代工匠做事之伟大和严谨，用料之坚实而不催。可惜的是梁思成在攀塔塔刹时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他很可能是这座木塔自建成后的千年以来，攀上刹尖的第一人！

我还读到过一篇回忆，说那时梁思成先生为了考察全国各地遗留的古建筑，想要摸个底，又苦于缺乏文献资料，再说自己腿力有限，不可能在不知实情的情况下一一跑遍。于是他想了个“妙招”，给全国每个县的邮政局长



都汇两块大洋，尽管不知对方姓甚名谁，他就写“某县邮政局长”收，然后在信中说，我们在考察保护中国古建筑，希望你们收到两块大洋后，最好能把县境内的古建筑拍成照片寄回来云云。那时的两块大洋也算不菲了，估计对一个县的职员来说，至少也有小半月的薪资了。让梁先生特别感动的是，寄出所有的邮政局长，都给他拍了照片寄回来了。尽管已是抗战的年代，而那时的世风仍十分的美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可以信赖。

如图的这封书札，是梁思成于一九三六年底致中华书局舒新城的信函，另还有几通，虽不同时，但都在前后三四年间，讨论的是关于梁启超先生文集和年谱的出版事宜。

新城先生：

顷接陈叔通先生函，籍悉先生深以成未将丁在君先生所编先严年谱契约签名寄奉为虑。成之所以迟延者，实因对于赵丰田先生所编长篇初稿，认为颇多尚须审慎详加斟酌的，拟俟全稿由林宰平先生审定后，再行签名寄呈，今悉因整份版税及会计手续上种种关系，不宜再缓，谨遵嘱签名寄上，延误之处，尚祈见谅。至于将来所抽版税，则祈按期交由地质学会翁咏霓先生收领，作为丁在君先生纪念基金之一部(分)为荷。尚此即颂

梁思成 敬上 廿五年十二月十日
附契约两份

书札中涉及几位人名，须稍作解释一下。陈叔通乃清末翰林，也曾参加过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是梁启超的老友。丁在君即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于民国六年曾随梁启超去欧洲考察，担任考察团的翻译和科学顾问，其杰出的才干深受梁的赏识与器重，遂成了忘年之交，并多次获得梁的提携。林宰平即闽派著名诗人林志均，也与梁启超交厚，其学问最为梁启超所佩服。所以梁启超临终前曾将自己的几大箱著作手稿，嘱咐子女说，我死后我的所有著作，请交林先生审定，日后编文集，文稿之取舍，皆由林先生来决定。故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林志均编定的《饮冰室合集》，共四十册，确是搜罗梁启超著作的最完备本。而丁文江作为梁启超极为信赖的传承者，则担负起梁启超的年谱编写

任务。无奈丁文江工作太忙了，年谱始终未能完稿。一九三六年初他在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时，不幸在湘南因煤气中毒而身亡。去世前，只得又将年谱工作交由赵丰田来继续完成。

这封书札即在此背景下所写。梁思成是家中的长子，也是父亲期望最多的孩子，他当年的读书、恋爱、留学，以及回国工作、研究方向等，无不浸透着父亲无微不至的关心与设计，当然，梁启超的“设计”是绝对成功的，在他的悉心指导下，终于培养出一个大师级的儿子。所以，父亲身后的著作出版事宜，梁思成当仁不让，皆由他费心协调。梁思成可能对赵丰田续写的年谱尚不满意，故迟迟未将出版合同签字寄上。此信因几经催促，也考虑到一些实情，故只得遵嘱寄上，并附“契约两份”即是。另关照将来版税，全部按期交给丁文江先生的基金会，让“翁咏霓先生收领”，翁咏霓，即与丁文江同时代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博士也。如图为梁思成的三通信札中最后一封，同另两封书信一样，均为墨笔书写，原件藏于中华书局档案馆。梁思成生于日本东京，童年时在日本上的幼稚园和小学，十一岁回到北京继续读小学和初中，后考入清华预科，留美等，虽然有家庭的影响，但在他不断地上学，在同时代的人中仍是出类拔萃的，然而，至于临池学书，由于一路读来的都是现代学校，肯定无暇顾及。因此其书法比起他的前辈来，自然要略逊一筹的。梁思成的此页尺牍，楷中带行，用笔规矩，虽结体和草法都有一定的法度，但也看不出有某碑某帖下有太大的功夫。倒是另一通写于一九三二年的信，有几个字颇近于乃父的北魏体，所谓近朱者赤，即使临帖不多，但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少年时受父亲的影响则是必然的。

梁思成不光有个大名鼎鼎的父亲，他还有一位才情绝世的妻子。尽管自己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名家了，但在林徽因的美丽光环映照下，他的光芒多少被遮蔽了许多。梁思成曾诙谐地说过：“中国有句俗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也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还必须不断地跟她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

通常人们对梁思成最深的印象，就是一九四九年之后面对北京城的改造，他与新政府之间不同意见的冲突。梁思成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保护与研究，深受西方重视古典建筑的理念熏陶，几十年来不断地在搜寻、抢救和记录我国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他说整个老北京，就是一个博物馆，如今看着几百年前的文物，一一被平白无故地拆毁，他怎能不痛心疾首，伤心流泪呢？

然而梁思成见到北京城墙被拆而流泪的事，却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据说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身边的干部说：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这里看过去全是建设新中国的烟囱……

梁思成闻此言大惊失色，连忙召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陈占祥——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下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此即著名的“梁陈方案”，建议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但提交之后却未被采用，结果反招来一阵又一阵的批判。其实，在五十年代像梁思成那一批知识分子，都是怀抱一颗爱国之心，真心拥护新政权和新社会的，他们有时只恨自己无能为力，旧思想还未能跟上新形势。梁思成就写过一首带有自我批评的诗：“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

书生意气，总是那么地真诚淳朴。但遇到了城市建筑的专业问题，他又认真了。梁思成曾说，共产党什么都好，就是不懂建筑。面对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他也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在阶级斗争上你比我先进五十年，但在城市建筑上，我比你先进五十年。你们这样做，五十年后，你们会后悔的！”

如今五十年已经过去，事实证明，梁思成的预言果然没错。但是，该后悔的人却早已不见了。

波罗的海三国「巡展」有感

● 杨祖柏

■ 简斋闲语

9月10日，笔者随团参加了在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举办的“上海之帆”一带一路经贸人文巡展，活动在促进城市之间、国家之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贸人文合作。此次上海推荐了鲁庵印泥、明止堂古砖拓片、枫泾农民画、徐行草编、杨行吹塑版画等11个“非遗”项目参加人文巡展。笔者作为其中代表还接受了为“三国”领导、政企业要员刻印印章的任务，以作赠送外国友人的礼品。十天巡展，布展——守展——撤展，一路跑来，颇有感触。

波罗的海“三国”不大，总面积为17.4万平方公里，从这个国家到下一个国家，乘上5小时左右的跨国大巴即可到达。此次巡展到了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立陶宛的考纳斯。三座城市虽小却印象深刻，小而美、小而静，尤其是那些中世纪的古建筑风采依然，让人惊叹。记得当年有一部热播电视连续剧《手机》，剧中的严守一总是念叨要去水边国度“爱沙尼亚”，让不少观众心生梦想。如今，这个遥远的国度，这座陌生的城市在“一带一路”的推进下，拉近了许多。

“上海之帆”是上海友协对外交流的品牌项目，此次将人文纳入其中，也是按照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努力，架设各国民间交往的桥梁，探讨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合作，营造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局面”。当然，与经贸相比，人文交流更具深远意义，它是丝路精神的核心要义，是增进国家和地区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因此，人文交流需要“人”“文”并重，既要“以文化人”，更要“以人为本”，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融进去。笔者以为，在民间力量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文交流中，还应四个方面不断完善与提高。

一是人文交流要精耕细作。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审视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与价值也是时代之要求。中华文化要与世界交流合作，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历史、风俗习惯”。中国“非遗”作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走出国门应首先考虑所在地的文化背景与风俗习惯以及审美需求。有的东西我们觉得不得了，可能在别人眼里就一般般；有的“特产”可能有着几百年的传承，但在异国他乡可能觉得不合“口味”。现在不少国家都建有“非遗”馆，在交流中可能也会偶然碰上二三个“中国通”等，所以，人文交流精耕细作非常必要。

二是要推荐优秀的“非遗”传承人去交流。“非遗”展示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专业”交流，它不是日常的科普展览，它需要“对话”与专业演讲，需要专业的解读与专业的演示。如果不是从事此项“非遗”的人去交流，可能在与外国友人交流时也只能说点皮毛，做个“传话筒”而已，很难把中国故事讲好、讲精彩。“非遗”交流有时也需要在现场用声音、形象或技艺作为表现手段的，那种“模仿秀”“报告式”的介绍是很难引起别人兴趣的。

三是要加强对外语言的学习。“一带一路”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地区，而语言的交流在人文传播中尤为重要。人文巡展，离不开语言媒介，可能也是一些人在国外交流最头痛的事情了，笔者也如此，有时因为跨文化的交流在文化与语言不同时，也会产生一些“障碍”。虽然身边有个翻译，但毕竟对指向的专业不甚了解，有时你激动快语，被翻译“演绎”后，对方表情不以为然，所以，有人提出人文交流需要“双语”人才。现在网络的确实发展，有的人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有道翻译”“谷歌翻译”等，临时解决一下交流中的语言障碍也是可以的，但这毕竟不方便，也显得不够“文雅”。

四是人文巡展需要互动。此次巡展交流，有关部门策划了形式多样的表演及互动活动，比如，卢湾中学民乐队与当地文化中心汇演；向明中学女篮与当地学校比赛；在展厅进行篆刻、徐行草编现场演示；到当地图书馆进行中国古砖文化讲座等。但是，现场互动还是不多，要让老外在互动中、体验中，了解中国“非遗”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感受“非遗”的魅力，互动应该是比较好的交流渠道。国与国的交流是从人与人的交流开始的，现在国外建了不少孔子学院，也被誉为什么“服务区”“加油站”，但是，对于中国书画来说可能还是在祖国的人说了算，有的师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胡正跃说：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建设重要驱动力。三年前，上海书协组织了“海派书法全球行”巡展活动，对传播中国书法艺术，促进人文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得到了社会关注。而今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上海书协是否有新的举措？主动拓展传播中国书法艺术的交流渠道？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就在写完此篇拙作时，笔者在《新华网》上见到一则喜讯：丁申阳“一带一路”书法艺术展在马来西亚举行。在此，笔者要为丁申阳老师鼓掌了！

● 王德彦

海派书家掀谭(十八)——赵叔孺

上海博物馆藏历代法书述略(十三)

● 刘一闻

《行书节录张燕东东山记轴》

清梁同书纸本纵1335厘米横438厘米

梁同书的书法主要起自以秀美婉丽著称的赵孟頫和董其昌两家，后继于颜、柳楷帖，兼得雄浑深秀之美。帖学书派多以功力见长，梁氏的高明之处，在于能举重若轻地将所学诸体融为一体风格，虽无脱净前人痕迹，然从其“帖家人看，不教人摹……帖宜置几案，以自表发，不宜刻画以自缚”的艺术观念和暮年操笔自运信手为书的创作状态看，时人将他喻为晚年胜书的欧阳询和文徵明，庶几可说是大体恰当。

《行书八言联》

清王文治纸本纵1753厘米横309厘米

素有“淡墨探花”和“浓墨宰相”之称的王文治和刘墉，是两位在艺术风格上可以相提并论互为比照的书法家。王文治楷书得自褚遂良、张即之和唐人写经体，行书学《兰亭》、《圣教》二序及首重札和董其昌。从总的书写风格看，他的书法亦归于清秀一路。对于王文治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褒者誉之为“秀逸天成，得董华亭精髓”，贬者论之“沾沾江上习气，入轻佻一路终不庄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管如此，王文治“笔力遒实，体制整密”的书写功力，却是当时大多数书家所难企及的。刘墉书法早年入手赵孟頫，中年之后变通诸家自成家数。在学习古人的过程中，刘墉的审美观念与“帖学四家”中的梁山舟相似，即不斤斤于形态而唯求精神合契。故尔相对于其他三家，他的书写风貌最为凸出。刘墉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能够在以娟秀华美甚至妩媚纤丽为主要表现特点的彼时书坛，异军突起地以“貌丰骨劲，味厚神藏”的雍容腴重之态自显，确属难能。刘墉之作，初看粗率拙钝，如从书法创作的惯常程式看，其点画结构几乎皆于法度或见于滞蓄，然细细推敲之下，方见大智若愚式的另种高明。刘墉用笔的以“裹锋打叠点画”并侧锋取势，和用墨的“以浓用拙，以燥用巧”之法，都是他的独到之处。 (未完待续)

印坛上有所谓的“瑜亮之争”，指的是吴昌硕与赵叔孺。陈巨来曾言：“近來印人，能臻化境者，当推安吉吴昌硕及先师鄞县赵叔孺时桐先生，可谓一时瑜、亮。”毋庸置疑，在当代吴昌硕的知名度远远高于赵叔孺，但就篆刻界来讲，这与历史是不相符的。吴昌硕与赵叔孺是近代海上风格迥异的两大篆刻派系，在艺术特征、传道授业和对印坛影响力上，两人颇具对比研究的意义。沙孟海先生就曾言：“安吉吴氏之雄浑，则太阳也；吾乡赵氏之肃穆，则太阴也。”可见对赵叔孺的评价极高。论年龄，赵叔孺小吴昌硕三十岁，与缶高足论古泥，赵云壑等同龄。当赵叔孺崛起之初，吴昌硕已主盟海上艺坛多年，正如日中天。赵叔孺发展的黄金期当在吴昌硕身后至四十年代末。吴昌硕的壮伟雄道与赵叔孺的精严雅驯，对海上百年篆刻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海上篆刻的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性。

1904年的甲辰夏日，西泠印社的创办，在篆刻艺术界树起了一面旗帜。与吴昌硕同为当时印坛巨擘的赵叔孺，门生众多，声名特盛，与西泠印社始创者丁辅之、王福厂关系密切。可是，赵叔孺为何与西泠印社无缘？是资望不够还是不想出山？从印社主要创始人吴隐当时在印社初创前后的作用及所处的有利位置以及如何由他做主请老 outgoing 西泠印社首任社长的史实来看，赵叔孺作为与吴昌硕相抗衡大家，怎肯屈尊而加盟西泠？茅子良在《上海篆刻的百年拓进》一文中讲到：“赵叔孺和褚德彝，当时同为吴昌硕刻印敲敲碰碰，担

任西泠印社社长算不得什么，有所反感，因此未加入西泠印社。”(见《书法研究》总第96期)。由此可以推断，是因为旧时代的文人相轻和艺术上的门户之见，使两大师失之交臂而分道扬镳。这里面的原因固然非常复杂，孰是孰非，恐非我等妄可断言，但它毕竟表明赵叔孺在当时印坛的地位和影响。

赵叔孺(1874—1945)，名时樵，字献忱，号二弩老人。浙江鄞县(今宁波)人。生而岐嶷，天资聪颖，垂髫之年即当众从容挥毫。所绘骏马，形态生动，宾客们论为神童。成年后宦游八闽，历署泉州、福州府等海防同知，饱览岳丈林寿图皮藏丰富的三代吉金文字及历代书画名迹，并苦研秦篆汉印与宋元以来篆刻。辛亥鼎革，赵叔孺自闽挈眷移居海上鬻艺。赵叔孺的寓沪经历，是“从38岁之后，赵叔孺从官场销声匿迹，携眷到了上海，以舞文弄墨为乐，以篆刻字画为生”。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中也有记叙：“民国后，即先后回居沪上矣。先生在民初元二年曾一度至江西人税务局长，不久又回申，寓虹口塘山路汀洞例书书画篆刻为生矣。”由此可见，赵叔孺在民国前后寓沪，长达三十余年之久。

赵叔孺的篆刻深受赵之谦的影响，其北魏之风格深得悲凉韵。他曾说，感同一派，篆刻之妙当推吾家捣叔，但吾不可为一家一派所囿。赵叔孺则由南、晚两派入手，由悲庵溯源秦汉玺印，印外求印，营造出一种典雅雅静的风韵。舒文扬评价赵叔孺的篆刻云：“他的朱文小玺，疏密合度，错落有致，锋颖如新而故意宛然；白

文玺则笔意分明，好似商周古彝器文字入印，一朴茂高古胜。秦汉铸印，篆法方圆适宜，增减屈伸冥会法度，布局妥帖生动，平实中透出朴茂沉雄之意，仿汉玉印之作，有能在坚挺醇厚中神韵中表现出一种酣畅流转的气势。”“张大千则评价为“寓奇诡于平正，寄超逸于醇古”。可见，赵叔孺的篆刻公认是丰赡妍美，风流婉约，是高贵、古雅的象征。

由于赵叔孺的姣好而雅正的印风，易于为人接受，所有慕名请益归依者络绎不绝，为印林罕见。其中有平陆陈巨来、永嘉方介堪、吴县潘子燮等，深得师承。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也曾尊赵叔孺为师。据《赵氏同门录》记载，赵叔孺所收门人大约有六十余人。在对学生的教导上，赵叔孺不赞成学生单纯传承老师的心得，而主张学生根据各自的禀赋和素质，确立研究上的侧重点。其众多学生纷纷成才，也验证了赵叔孺的育人方法十分成功。赵叔孺以师长的宽厚温和与他所营造的多元、包容、平等的师门艺术环境，使其门下能吸纳众多不同背景与专长的弟子。其中除了方介堪、陈巨来、沙孟海、叶潞渊、陶寿伯、赵鹤琴等精研篆刻，张鲁龢、方节庵痴迷印谱、印章收藏外，还有善于鉴定的徐邦达、工于刻竹的支慈庵，以及钱庄经理叶葵青、著名医师程祖麟、沈钧儒之子沈叔羊等。赵叔孺在艺术创作上没有门户之见，也深知“术有专攻”的道理。他擅长挖掘，激发每位学生的智能优势，强调学生不必拘泥于摹仿老师的面目，而是要学习古人之

精髓。在他精心栽培下，方介堪专攻鸟虫篆和汉玉印，叶潞渊撷取两汉与皖浙之精华，陈巨来则将元朱文推向了极致，堪称枝繁叶茂。流风余韵，至今仍焕发着勃勃生机，体现出赵氏篆刻派系包含博大、深邃的艺术潜质和后世者易于自塑的基因。除此之外，赵叔孺能不失时机地为弟子们提供展示成果的机会。如1942年与1944年元旦，年届古稀的赵氏率众子弟，以团队的形象齐齐亮相，在上海成功举办了两届“赵氏同门金石书画展览”，显示出非同寻常且令人仰慕的实力。赵叔孺不愧为优秀的教育家。与赵氏一门英才辈出，成绩斐然相较，缶翁东徒生前均显赫一时，但如今却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尽管吴昌硕也有高徒，如赵云壑、王个簃、诸乐三等均为海上名家，但他们几乎没有能够脱掉吴昌硕的影子。如吴昌硕所散发的强大个人艺术魅力和极致独特的个性，往往会弱化弟子的想象力和思考力，他们大多数以逼肖乃师为己任，难免会成为老师的附属品、复制品。在明月的周围真的很难显示出耀眼的明星！

赵叔孺是一位传统书印的通才，所作“渊雅闲正，瑰丽超逸”。他不仅善四体书，精绘山水、花鸟，画马更有“一马黄金十笏”之称。1912年，赵叔孺编辑了《汉印分韵补》六卷。这一时期，是他艺术上的黄金时期。赵叔孺篆刻远绍周秦两汉，近抱赵之谦及皖、浙、黔诸子，又善于采撷南周彝器铭文入印，并使已成绝响的元朱文等经典印式重放异彩，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大家。